

# 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 以武重奉及其小说《红运》为个案

夏露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100871)

[摘要] 1930年代以前越南的小说艺术与中国非常类似,也长期受“史传”和“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随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语言政策的改变,越南从传统的汉文化圈国家一步步走向西化道路,这种西化趋势在1930年代最为显著,因而越南把1930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本文仅以武重奉及其长篇小说名著《红运》为例,管窥越南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潮流。

[关键词] 红运;1930年代;越南;西化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17)03-0140-07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7.03.022

20世纪以前越南一直是一个传统的汉文化圈内国家<sup>①</sup>,其小说艺术与中国非常类似,基本长期受到“史传”和“诗骚”两个传统的影响<sup>②</sup>。这是因为越南早在秦汉时期就被纳入中国版图,直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取得独立以前,越南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与中国实为一体。公元968年越南取得独立,但不久就遣使入宋求封,建立了宋越宗藩关系,从那以后,直到1885年法国将越南全境纳入殖民统治,这种宗藩关系才结束。在这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越南古典文学的发展始终都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进行,具体到小说创作,如果说中国古典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两条道路,越南则有汉文和喃文两水分流。汉文小说方面有在《三国演义》影响下的《皇黎一统志》等汉文历史小说系列;有《剪灯新话》系列小说影响下的《传奇漫录》等传奇小说系列;有《搜神记》等影响下的《岭南摭怪》等神话小说系列。而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也被越南吸收和模仿,但主要是被改编成喃文长篇诗体小说,例如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就被越南大文豪阮攸改编成了《断肠新声》(又称《金云翘新传》、《翘传》等),成为越南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杰作,并在20世纪初被翻译成法文走向世界<sup>③</sup>。

1918年,法国殖民当局在包括越南在内的印度

支那地区实行新的语言政策并于1919年取消了越南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同时汉文的官方地位消失,喃文也逐渐成为死文字。彼时虽然还有不少人从事汉文创作,例如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在1920年代还用中文创作了不少重要的小说和传记作品,胡志明在1940年代著有汉文诗集《狱中日记》;但总体而言,随着汉文官方地位的消失和拉丁字母文字的推广,越南文学一步步远离传统,也远离中国这个汉文化圈中心,开始向法国文化中心靠拢。越南社会一步步走向西化道路。这种西化在1930年代最为显著,因而越南把1930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本文仅以武重奉及其长篇小说名著《红运》为例,管窥越南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潮流。

## 一、“越南的巴尔扎克”——《红运》作者武重奉

如前所述,越南古典小说受中国影响巨大,因而相关作家作品也常常用来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他们最高的评价莫过于与“中国并驾齐驱”。例如《传奇漫录》的作者阮屿被誉为“越南的蒲松龄”;《断肠新声》(即《翘传》)的作者阮攸被誉为“越南的曹雪芹”。到了现代,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也有一些现代作家依然被与中国作家相提并论,但越南作家

[收稿日期] 2017-01-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南亚现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批准号:15JJD750002)”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夏露(1974-),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教研室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的比较对象不止中国了,《红运》的作者武重奉就被誉为“越南的巴尔扎克”,这表明越南文学受到法国等西方文学的影响。

最早将武重奉比作巴尔扎克的是他的朋友——诗人刘重庐<sup>①</sup>。1939年10月25日刘重庐在河内的一处墓地边宣读了他为刚刚辞世的武重奉写的一篇悼文,文中他认为武氏在越南当时的文学生活中的重要性堪比法国19世纪作家巴尔扎克,并指出武氏作品中描写的二战前的越南社会全景图与《人间喜剧》中19世纪法国社会有相似之处。巴尔扎克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被誉为“法国现代文学之父”,1829年,他以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并开始进入《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1830年代及1840年代,他在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广泛接触社会,还为几种报刊撰稿。巴尔扎克一生创作90多部小说,塑造了240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汇集成《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书记”,他用小说反映社会,也进行社会研究,他的《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武重奉比巴尔扎克短命许多,这位天才的作家在人间仅仅度过27个春秋。然而他却有着与巴尔扎克一样忘我的创作精神,在他从事写作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给后世留下了9部长篇小说、7部长篇纪实作品、2部长篇话剧、数十部短篇小说、笔记、小论、译著等诸多文学类型的作品。武重奉早期在报社工作,也同时为几家报刊撰稿。武重奉是越南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也像巴尔扎克一样,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有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红运》看起来就像是做过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调查之后写出的社会学著作。而且,除了写小说之外,武重奉还是越南最早写报告文学的作家,著有《嫁给法国人的艺术》、《害人的陷阱》等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他也因此获得“北部纪实文学之王”的美誉,引领了越南纪实文学潮流。

与巴尔扎克出身中产阶级不同,武重奉来自社会底层,他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社会最底层的人的生活的。武重奉于1912年出生在河内。当时随着法国的殖民统治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及西方生活方式迅速向越南渗透,河内这样一个越南古代文明的摇篮很快变成了印度支那资本主义经济首府。武重奉的父亲武文麟出生于河内东南部两百公里之外的兴安省美豪县一个贫困家庭,年轻时来到

河内,成为一名电工;他母亲则是缝纫厂的一名工人。跟许多从农村移居到城里来的人类似,他父母租住在河内著名的36古街的一个窄小的房子里。更为不幸的是在他7个月时他父亲因肺病去世,彼时他母亲年仅21岁。武重奉短暂的一生正好处于印度支那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他出生前7年,1905年,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发动了“东游运动”,带领阮尚贤等文人东渡日本寻求救国良策。这是受到西方民权论和中国康梁思想影响下的越南维新抗法运动。与此同时,越南另一位政治家潘周桢主张“废除君治,建立民治;开通民治争取民权;依靠法国进行社会改革”。1907年,梁文乾、阮权等人在河内开办“东京义塾”,其中有一部必读教科书《文明新学书》,教学内容上欲消除保守腐朽的儒家学派,向学生灌输自然科学、公民道德等新思想。东京义塾还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字母文字,因为这种文字易学、易记有利于尽快提供人民文化水平<sup>②</sup>。1918年5月,法国驻越南总督沙罗(Albert Sarraut)改革了印度支那的基础教育,颁布《学政总规》,将包括越南在内的整个印支联邦的教育纳入法式教育体系内,那一年武重奉正好是小学入学适龄儿童,于是他成了北越第一批接受法语和拉丁字母化越南语教育的小学生之一。最重要的是他所就读的公立学校实行小学六年免学费的政策,这对于幼年丧父,仅靠母亲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他们一家来说,简直就是福音。试想,如果他早出生10年,以当时的越南经济和社会状况,他可能就是一个文盲,即使进入学校读书,他的启蒙教育也应该与先前的北越知识分子一样,接受四书五经类的儒家经典教育,那么西方文化对他的人生和创作的影响就很难预知了。

武重奉14岁就辍学谋生,他接受的学校教育有限,但早期接受的西式教育为他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他后来发表的许多报刊文章中,他引用过左拉、雨果、马尔罗和高尔基的言论<sup>③</sup>。他19岁出版的剧本《毫无声响》的开头部分里用了左拉的话<sup>④</sup>。他20出头时就翻译了雨果的剧本《卢克蕾西亚·博尔吉亚》(Lucrecia Borgia, 1833)。他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还提及福楼拜、波德莱尔等。他发表的报刊文章很自然地提及了纪德和魏尔伦的同性恋关系,指出了俄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形式差别,提到了法国当时的流行刊物《新文学报》<sup>⑤</sup>。他在创作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仿佛解剖人物性格,这在长篇小说《红运》中也有体现<sup>⑥</sup>。这表明武重奉在

当时是一位与国际接轨的作家,这种接轨的基础是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语言政策,是字母文字的推行以及法语教育在越南儿童中的普及,是法国文学在越南的输入。这一切也表明越南社会在1930年代向西方文化迈出了大步伐,产生一位巴尔扎克式的作家也是情理之中。

## 二、《红运》所反映的以河内为代表的越南都市西化图景

长篇小说《红运》虽然是虚构作品,但发挥了作家擅长的纪实文学优势,逼真地反映了当时越南以河内为代表的都市西化图景,这种西化体现在如下诸多方面。

### (一)主人公红头发阿春的形象

《红运》中一号主人公是阿春,全称为“红头发阿春”。他那一头标志性红头发形象已经成了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堪比鲁迅塑造的阿Q的赖头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越南人乃至黄种人,自古以来罕见天生红头发,而在上个世纪初,东方世界也无将头发染成彩色的习俗;所以,阿春的一头红发在当时的社会分外鲜明,也分外具有欧亚混血特征,预示着他要洗刷自己的根和本我。作者在书中叙述他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流浪儿,热带的“阳光让他的头发变得像法国人一样红了……他在网球场求得一份捡球的差事,在那里大约只捡了一年左右的球。不过他学打网球非常快,赢得了球场里的法国人和越南人的喜欢”<sup>①</sup>。阿春他后来之所以从底层一步步攀上上流社会,与西式运动尤其是网球在河内的普及有关。而网球运动最后还让他当上了万众瞩目的英雄,小说最后部分写他与暹罗(今泰国)网球冠军的比赛中,在即将得胜时,听从法国总督的指示故意输掉了比赛,目的是为了“保持与友邦的友好”。比赛散场时,阿春站在汽车上慷慨激昂地宣称他“拒绝个人的声誉”,“挽救了祖国的安全与和平”。万众欢呼声雷动,欢呼这位“把他们从战争灾难的边缘拉回来的救国英雄和伟人”。他因此获得了总督府授予的“北斗”奖章,鸿老爷则宣布将女儿阿雪嫁给他。可以说,阿春的一切成就与网球运动息息相关。

当然阿春的西化不仅体现在红头发和网球运动上,更体现在他的社会价值观的迅速西化上。例如他曾到法国留学生文明开设的一家专门为“欧化”运动中的女性服务的时装店帮忙,起初他看到那些袒胸露乳的服装惊奇不已,但很快跟店长学会了如何

用听起来文雅的语言去兜售。他对一位面临丈夫压迫的女顾客说“夫人您的衣服只不过显示出一副良善端正的样子,一点都不时尚”。然后向她推销那些代表着“诗意”、“征服”、“别碰、住手”之类含义的新潮服装去改变形象,争取“女权”。后来他因为管理时装店成功而成了社会改革家。阿春还因曾帮人沿街叫卖假药,熟悉了许多西方医药名词及药用功能,而摇身一变为医学院的学生,以此招摇撞骗。这在此之前的越南的传统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药和中医一直享有很高的地位,15世纪一位越南出使中国的使臣黎文老曾言:“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可见,书籍和药材自古以来便是越南从中国输入的两大宗货物,对于他们的身心有着巨大影响。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可是,到了《红运》里,到了红头发阿春的形象里,我们看到了西医及其受欢迎的新现象。

### (二)女性人物的婚恋观

小说里有关都市的西化还体现生活观念尤其是在西方婚恋观对越南传统观念的颠覆。越南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20世纪初期以前,越南女子从小也接受《列女传》思想熏陶,为人讲究三从四德,节妇烈妇的故事长久以来也十分普遍。但在《红运》里,几位女性人物的婚恋观受到西方影响,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例如小说里的海关副关长夫人。她是一个寡妇,曾结过两次婚,其第一任丈夫是法国人,生前任海关副关长。她一直以曾嫁给法国人为荣,所以虽然法国丈夫去世多年,她还是乐意让别人称呼自己为“关长夫人”,婚恋观十分开放。小说开头部分写到她找算命先生算命时,有如下描写:

关长夫人皱了一下眉头,带着呵斥的语调说:“怎么回事?抱怨啥?从前我家通判先生非常正派,而关长先生也是如此,也非常忠厚。关长先生临死前还大声说着爱怜我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拥有两任这么好的丈夫?”

“启禀夫人……可是,按照古训,一女不侍二夫,您两度嫁人,是要被人诟病的。”

“嗯,以往确实如此。可是当今社会,嫁几个丈夫都行,只要他们是正派的人。”<sup>②</sup>

此外,小说中还描写她第一次见到阿春后就春心荡漾,把他带回家后,刻意让阿春在浴室外等她,她进去洗澡的时候还通过浴室的小孔偷看阿春的反

应,这都表明她已经把古训彻底抛之脑后。

在《红运》里,关长夫人并不是唯一一位开放的女性,小说写到的主要女性的婚恋观几乎都是相当开放的,例如鸿老爷的几个女儿就都如此开放,小女儿阿雪在婚前就几番试图跟红头发阿春发生性行为。而他的大女儿黄昏思想行为之离经叛道更是令人咋舌。她是一个张口闭口女权的所谓新时代妇女,多次在蓬莱宾馆与情人幽会,当情人要求她离婚与自己结婚时,她跟情人之间有如下对话:

情人说道:“亲爱的,我不想一直这么偷情,太危险了。”

黄昏反问道:“那哥哥你想咋样?”

“我想你……我们干脆结婚!”

“你的意思是让我跟我丈夫离婚?”

“可不是嘛。”

“不,先生啊。我只不过想让你做我的情人罢了!你想做我丈夫?你做了我丈夫,头上长角(译者注:相当于戴绿帽)的就是你了!与其这样,还不如他替你长角。”

“完了,完了!你是什么女人啊,你竟然是一个有这种思想的女人!”

“怎么啦?怎么啦?只不过你们男人从来不这么想了。要说现在的妇女,哪个不是这样想的?只有丈夫而没有情人?就是胆小鬼,就是丑女人,是没有什么德行的女人,是没才没色的女人,这种女人鬼都不愿意搭理的!要是我没有情人,我的朋友会轻视我,我还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sup>⑩</sup>

这种惊人的情人观即使放在性观念开放的当今社会也不会被广泛接受,何况是1930年代的越南,可见当时西方思潮对越南城市妇女的婚恋冲击之深。

### (三)都市生活方式的西化

《红运》反映了20世纪初越南社会迅速变化的过程。随着市场的经济的发展,以河内为代表的越南都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红运》一开头写居民区不远的网球场里传来的网球声及用法语记录比分情况,将读者立刻带入西方文化视野里;接着写河内古街的人行道上卖柠檬水的男人、卖甘蔗的女人,反映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渗透,尤其是殖民者占用大量良田种植经济作物,不少失地农民被迫流亡到城市谋生的情况。

在法国殖民统治以前,河内的规模很小,人口也很少,布局十分古老,但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河内发生了巨变:旧皇城被拆除,建立起法国居民区,

建设了一座座雄伟的法式建筑,安装了路灯,建设了现代的城市排水系统,现如今河内的老城依然都维持着从前法国殖民时期的格局。随着都市公共服务业和工业的发展,河内居民人数激增,1921年为7万5千人,1931年达到12万8千;而到1937年,河内人口则为15万4千人,短短十几年间人口数翻番,尽管其中经历了世界经济大萧条。当时的越南学者深刻感受到了河内城市的巨变,慨叹跟法国文化接触的几十年的变化相当于过去几百年的变化,“现在我们住西方式的房子,戴西式的帽子,穿西式的鞋子和衣服,用电灯、钟表、汽车、火车、自行车……无所不用!家庭争相让孩子去殖民地学校学习,象形文字在国语字面前显得落伍,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代替了孔子”<sup>⑪</sup>。

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的重要的标志是报刊业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红运》里红头发阿春曾被增福法师聘请为《木鱼报》的顾问,目的是大力宣传他们那一派的佛教,跟其他教派竞争佛教徒人数和相关捐赠。报刊业是法国人统治越南之后当地才兴起的。在法国自南向北逐渐吞并越南的过程中,早在1865年就在越南南方创办了第一份报纸《嘉定报》,但此后60多年间(1865—1918),越南全境大约也只有30种报纸。不过,到了1930年代越南报纸猛增到了400种。这些报纸涉及新闻、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科学、体育、电影、妇女、时装等等各方面的内容。

此外,《红运》的语言也体现出了都市生活的西化,书中出现了一些新越南语词汇如进步、科学、社会改革、女权、体育运动、文明、新潮和欧化,等等,《红运》的一些语言如今已经成了越南人约定俗成的成语,越南人无论是否读过武重奉,都会在生活里使用他作品中的一些短语和词汇。这在越南语言历史上是罕见的。《红运》小说语言里夹杂了不少法语词汇,还有大量广告艺术语言。尤其是主人公红头发阿春,简直就是一位使用现代广告语言表达的天才。他的广告语言的训练始于童年时帮人做小买卖,用喇叭喊假药广告、在电影院举旗子当导引员,等等。在蓬莱宾馆,他在一场口占诗歌比赛中打败了对手,就是用他之前卖药时经常念叨的药物功能韵文材料。而后来,当他去服装店做导购、假冒医生看病、谈论新诗和政治时更是一步步发挥他的广告天赋,小说的最后,他在网球决赛中抚慰愤怒的群众的语言,简直就像一位口若悬河的西方政治家。

《红运》里出现了许多新型人物如城市流浪儿、

现代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时装模特、医学专家、先锋艺术家、留学生、改革派记者和新潮的妇女。而且,《红运》里所有人物,从卑微渺小的佛教人物到最理想的社会改革家都随着这城市的西化变迁,加入了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中,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都被利润动机支配。且不说剥削资本家中的代表维克多·班在房产、宾馆、药店等方面处心积虑地算计利润,就连普通警察甚至宗教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当时的商品经济潮流,这是过去以农耕为主的越南社会难以想象的变化。所以,越南文艺评论家杜德晓说《红运》忠实地描绘了深受欧化运动影响的都市生活,他认为武重奉是越南最大的都市作家,《红运》是百分百的都市小说<sup>⑧</sup>。

#### (四)《红运》的传播方式的西化

《红运》这部杰作最初是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河内报》上,从1936年10月的第七期开始连载,1938年成书出版。这是20世纪以后越南才有的小说传播方式,更确切地说是1930年代以后才突然兴盛的书籍传播方式。

如前所述,越南报刊业在1920年—1930年代迅猛发展,这深刻影响了文学的传播,也令许多作家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时代。武重奉小学毕业后就因家境贫困辍学到一个印刷厂当打字员,之后去报社工作。他17岁开始创作,在《午报》、《日新》、《海防周报》、《河内报》、《将来》、《礼拜四小说》、《香江》、《印度支那杂志》、《时务》、《骚坛杂志》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可以说他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几乎都与报刊业相关。武重奉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在《午报》上发表的。这份报纸的创办者黄积周和杜文都曾经在巴黎留学,他们的报纸是最早按照法国报纸杂志标准创办的越南国语报纸。武重奉曾经在《午报》工作,那段经历促使他走上了创作道路。《午报》不仅编辑出版了他最初的几部短篇小说,还向他展现了都市生活方式、世界主义和现代办报方法,这些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午报》也为他拓展了文学圈子,他后来与10多家报纸保持密切联系,都与《午报》有关。

从武重奉的写作事业来看,可以说报纸的商业化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南文学的发展道路;在过去长达千年的越南封建时期,虽然书籍刊行也是源源不断,但由于汉文教育并不能普及到农村,作为一个农业国,越南的文学主要受众是农民,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韵文形式口口相传;而报刊业发展起来以后,加上易学的

国语字母文字的推行、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越南的文学受众有了大量的市民,文学的传播也以听众为主变成了以读者为主,读者甚至直接在报刊上参与讨论。

例如,由于《红运》里的描写的各种人物影射了自力文团成员,给武重奉在文学创作上带来劲敌。他们彼此的敌对状态对当事人来说是不愉快的,但他们的论争促进了越南文坛的交流。自力文团的另外一大劲敌是范琼及其领导的《南风报》,该报是1917年—1934年间由殖民地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主办的,范琼本人精通汉文和法文,但思想上依然坚持传统,对越南古典的翻译与传播贡献很大。自力文团起初的任务就是反击《南风》报的保守倾向。自力文团存续的十几年间对越南文学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浪漫主义小说与当时的革命文学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越南现代文学初期三大潮流。一零、概兴等人创作的《断绝》、《蝶魂梦仙》、《花担子》等浪漫主义小说至今依然被视为经典。文团中还有一些作家后来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如阮公欢、秀肥、吴必素等则都成为重要的批评现实主义作家;而文团里的一些诗人如刘重庐、世旅、辉通、春妙、辉瑾,等等,都是越南新诗运动的旗手,为越南现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以《红运》为代表的越南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写作与传播方式,而由于法国的殖民统治,客观上促进了越南与西方的交流,越南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促进了越南文学的现代化。

### 三、从《红运》与武重奉所受的争议看西化潮流

《红运》发表之后不久,就引起了争议,1936年9月有署名泰飞的人在《文讯报》上发表《淫秽文章》批评武重奉“借口写真主义,毫不顾忌地描写淫秽的东西”。随后,武重奉在《河内报》上发表了《致〈淫秽文章〉作者泰飞的一封信》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其实,就《红运》本身的文字描写来看,并无像西方《查莱太夫人的情人》那样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对情色的细致描绘,甚至没有任何地方描写具体的两性生活;但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思想、行为举止确实远远超出了过去男女授受不亲以及女子三从四德的道德观念。这番笔战恰巧折射出1930年代越南社会西化过程中的新旧矛盾。

而1937年3月,著名作家一零化名为一枝梅在

《今日报》上发表《淫还是不淫》对武重奉进行指名道姓地批判,而其主要缘由则是《红运》中所讽刺的社会欧化运动被指影射自力文团的社会改革计划。可见小说发表之初的争议就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交流。到了后来,随着越南抗法和抗美战争的发展,武重奉及其作品更是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越南文坛重要的“文学案件”,包括《红运》在内的著作从1945年到1986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之前在北部越南被禁了41年。

从写作上讲,《红运》的形式和内容都深受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在1940年代初,越南学者武玉潘就撰文指出《红运》带有概述性的诙谐剧形式令人想到银幕上的搞笑场面,而对红头发阿春的形象的塑造则借鉴了哑剧舞台明星卓别林的表演。也有人认为小说每一个独立的章节就像独幕剧,有拉伯雷风格。1950年代,韶光和阮梦想撰文比较了《红运》与莫里哀的讽刺喜剧。当时莫里哀的不少剧本被翻译成越南语在越南地区演出。此外,谈到红头发阿春从流浪儿到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经历,还有不少人将《红运》与巴尔扎克的《幻灭》相提并论,还有人说《红运》受到1930年巴黎著名的电影《流氓皇帝》(Le Roi des Resquilleurs)的影响。当北越1945年建立共产党政权之后,其首要任务是抗法,将法国从越南赶走;经过9年抗法斗争,随着1954年奠边府大捷,法国撤出了越南,结束了近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北越又与美国支持的南越进行了20年战争,直到1975年统一全境。在1945年—1975年三十年的抗战中,北越文学的主流是革命文学,以《红运》为代表的一些作家作品自然被打入冷宫。

可以说,对武重奉作品的争议很多是体现在政治倾向上的,例如1949年越北文艺研讨会上,有人批评武重奉缺乏革命精神,著名诗人素友则为他辩护说:“武重奉不是革命作家,但革命感谢他揭露了社会的丑恶现实。”而武重奉作品受到最致命的打击是1960年6月,当时的越共政治局委员黄文欢在越南的权威学术杂志《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武重奉作品在越南文学中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该论文以长达20页的篇幅驳斥了武重奉最有名的几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决堤》和《红运》等在越南文学领域的重要性,同时对作家本人的政治倾向提出了怀疑,呼吁抵制“人文佳品”<sup>①</sup>派对武重奉作品的公开宣传。论文引述并抨击了“人文佳品”派的如下所谓反动观念:“八月革命之后,在党的领导下,作家必须服务于政治,因此作家失去了自由、作

品没有了灵魂;而武重奉这样一个天才作家,不需要革命,不需要党的领导也能写出优秀作品。武重奉是我们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身体虽然不在了,但其作品永远活在文学史上。他是一代文学宗师,他超越于全党的革命。”<sup>②</sup>黄文欢的文章发表之后,北越对武重奉的作品全面禁止印行。

不过,我们从黄文欢的文章恰恰可以看出武重奉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越南社会在1930年代所受的西方思潮影响。与北越的情形不同,在1954年—1975年南北越分裂期间,武重奉的作品就已经深入到南越大众,其作品的语言也成为老百姓日常的口头禅,作品的风格尤其是纪实文学成了南方纪实文学写作的奠基石,先后有作家武平、黄海水、文光、诸子等等步其后尘,形成了南方纪实文学流派。究其原因,南越之所以能继续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武重奉的作品,在于南越政权是在美国支持之下的西方政权模式,社会观念比较西化。

1986年越南党的“六大”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市场经济逐渐替代计划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重新接受西方影响,武重奉的“文学案件”再次得到讨论并得以彻底解决,武重奉在越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肯定,作品得以重印发行,《红运》和《暴风骤雨》等也被节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而2012年越南曾隆重纪念武重奉诞辰100周年并发行相关纪念邮票,邮票版面是作家肖像和他的《暴风骤雨》、《红运》、《决堤》、《妓女》等著名作品。

总而言之,《红运》及其作者武重奉的争议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着越南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再次证实了文学的的确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另外,与世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红运》之所以成为越南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是因为它有经典的人物形象。红头发阿春这一人物形象深深地打上了1930年代越南社会西化风潮的标志,它体现了当时越南与西方的交流,越南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越南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学者潘巨棣曾言“进入20世纪,西方文化日益向越南渗透,但并没有吹走东风,而是在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上,我们随时准备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sup>③</sup>。而事实也正是如此,1930年代以后,越南的文学和社会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文学文化因素,进入了现代文学文化的新时期。

注 释:

① 汉文化圈又称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等,是以正统汉

- 文化的观念及五服制的政治思想支配,遵守四书五经的古典教训,视中国为世界中心,视华夏文明和思想为最高价值的文化区域,包括东亚、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区,历史上最典型的汉文化圈国家是中日韩越四国。关于汉文化圈的提法及论著参见法国学者汪德迈的著作《新汉文化圈》,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
- ② 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史传和诗骚传统的论述请参考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③ 以上论点可参考笔者博士论文《明清小说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200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
- ④ 刘重庐与武重奉同龄,是越南新诗运动的旗手之一,其诗风深受法国诗人瓦莱里影响。
- ⑤ 实际上越南现行的拉丁字母越南文书写形式是17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在过去西班牙、葡萄牙传教士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整理而成,早期使用的规模很小。1860年以后法国就自南向北逐步蚕食越南,直到1885年将越南全境变成殖民地。但由于越南人对汉文的深厚感情,法国人推广字母文字并不顺利,真正大规模推广是在1919年越南彻底废除科举制度以后。
- ⑥ 武重奉:《答〈今日报〉:淫还是非淫》,载《未来报》,1937年3月25日。
- ⑦ 武重奉:《毫无声响》开头引用了左拉的这句话: Planter enfin le véritable drame humain au milieu des mensonges ridicules. 全文参见阮登梦主编的《武重奉全集》第一卷第1—63页,河内:文学出版社,1987年。
- ⑧ 《有关报告文学的问题》载《未来报》,1937年3月11日。
- ⑨ 武重奉:《妓女》,书前有黄少山的序言《〈妓女〉:一部有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序言里谈及了武重奉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
- ⑩ 此处引文由笔者译自武重奉《红运》第13—14页,越南:海防出版社,2000年。
- ⑪ 此段引文由笔者译自武重奉《红运》第39页,越南:海防出版社,2000年。
- ⑫ 此段引文由笔者译自武重奉《红运》第134—135页,越南:海防出版社,2000年。
- ⑬ 【越南】怀清、怀真:《越南诗人:1932—1941》第16页,河内,1996年。
- ⑭ 参见【越南】杜德晓《来自武重奉的〈红运〉言辞浪波》,收入《作家武重奉与我们》一书。
- ⑮ “人文佳品”派是1955年—1958年间越南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他们以《人文报》和《佳品》杂志为阵地,主张“文艺跟政治相互独立”,党不必领导对文艺,认为“文艺和政治齐肩并进,互为利用,双方有利”,认为文学艺术家是“时代的良心”,“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仲裁”,贬低抗战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文艺为工农服务的口号。这是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时间较长的政治斗争和文艺斗争。1958年初,越共中央作出决议,同年6月越南文联常委会把“人文佳品”集团定为“破坏集团”。“人文佳品”集团的部分成员被开除出作家协会,有些人受到了处分(1989年对黄琴、陈寅等人的处分已撤销)。这场斗争的胜利保证了越南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相关论点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编《东方现代文学史》上册越南现代文学部分,李修章撰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 ⑯ 黄文欢的论文后来收入阮衡穹、来原恩编撰的《武重奉其人及作品》第219—245页。河内:作协出版社。
- ⑰ 【越南】潘巨棣《20世纪越南文学中的几类新趋势》,越南《文学杂志》,2001年第10期。

## Vu Trong Phung and His Novel *Dumb Luck* are Used a Case to Discuss the Westernization Trend of Vietnam in 1930s

XIA Lu

(Oriental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art of fiction in Vietnam before 1930 wa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China, 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two traditions of *Shiji*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hi Jing* (*The Book of Songs*), *Li Sao* (*The Lament*)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language policy of France changing in colonial Indochina, Vietnam, which was one of countries in Chinese culture circle went step by step toward the the road of Westernization. Westernization of Vietnam was most significant in the 1930's. We want to glimpse the trend of Westernization at that time through the novel *Dumb Luck* (*Số đơ*) and its author Vũ Trọng Phụng

**Key words:** *Dumb Luck* (*Số đơ*); In the 1930's; Vietnam; West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张晋海】